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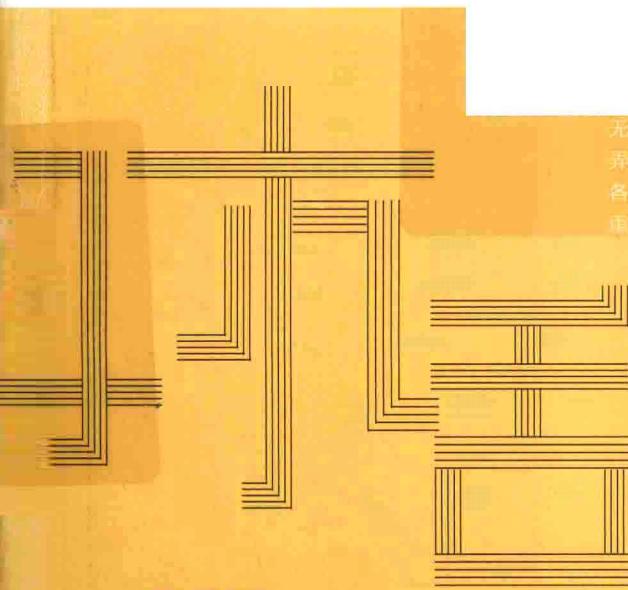
新世纪
文学观察

主编：续小强

对话： 新世纪文学 如何呈现中国经验

朱小如 ◎ 著

无论是被大时代所裹挟下的芸芸众生的无奈命运，还是时代弄潮儿们生龙活虎的人生搏斗，平凡和精彩一样都是活着，各有悲欢而已。哪一个生命个体的陨落，不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哪一出人生的谢幕，不该赢得热烈鼓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JING HUA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对话：
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
中国经验

朱小如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 / 朱小如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 /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7-5378-4009-5

I . ①对… II . ①朱…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218 号

书 名：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

著 者：朱小如

责任编辑：赵 婷

装帧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印 张：1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009-5

定 价：30.00 元

出版说明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新世纪中国文学酝酿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征。应该说，把新世纪文学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演进发展的新阶段，是可以成立的。

约略八十年前，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了及时回顾总结这十年的文学发展，赵家璧先生延请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学名宿，编选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1927年）。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后来者的启示作用也日益突显。

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我们组织出版这一套“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的根本要旨却与当年赵家璧先生约略相同，我们亦希望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分阶段地对新世纪文学做认真的捡拾、回顾与总结。本丛书依照文学文体的分类，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与研究；所延请的作者，无论年长年幼，均是长期以来对相关文体做跟踪研究的学者或批评家。故而，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是新世纪文学创作成就的展示，同时也是新世纪文学批评与研究实绩的见证。

我们期望，本丛书的推出，既可以推动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创作向更纵深

2 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成为作家和读者了解新世纪文学的一扇窗口，更可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从某种角度充分说明，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正处于一个极好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日子里，传统的文学样式当会有更好的发展，如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亦会呈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这一套丛书也将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第一辑之后，一定会有不断的跟进。举凡有学术创建、以新世纪文学为考察研究对象的书稿，我们就会将其纳入进来。一方面，我们要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鼓与呼；另一方面，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关注，将是北岳人恒久的出版责任和使命。

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续小强

沪上资深编辑、批评家朱小如坐在我的对面，娇小的身躯和白皙的皮肤带有南方人特有的印记，随意中略带时尚的装束使人感到不像学院派的学者，这是在西部作家冯玉雷《敦煌遗书》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最为直观的印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将近十分钟的发言，这是我在研讨会上正式介入当代文学并发言，作为一个圈子外的人，发言本没有奢望引起什么人的重视。但会后一些专家尤其是朱小如对此发言印象深刻，给予当面的赞誉，使我受宠若惊。以致三年之后，再次见到他时还能记忆如新，使人不胜唏嘘。今年4月29日，我与冯玉雷陪伴他去青城，有一天的时间聆听他的高论并做粗浅的交流，其间深感他阅见广泛，才思敏捷，思致绵密，博闻强记，新见迭出，遂生出将其作为个案研究的愿望。

朱小如文学批评活动主要包括发表正规的学理论文和在研讨会上发言（文中称为著文，为有声的批评），编选、荐文和出席研讨会但未来得及的发言（文中称为行为批评，为无声的批评），谈话（与批评家的对话以及他作为记者对别人的访谈），其间均可以看出他的思致和才华。作为一个媒体批评者的典型案例，作为一个栖身文学媒体而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者，其批评行为和批评文字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著文：有声的批评

通过著文发出批评的声音，应该是朱小如涉足文坛的重要方式。

作为批评家，朱小如先生视野广阔，兴趣广泛，其前期批评主要是针对戏剧和电影等艺术样式发表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并对具体的作品发表了看法。从已刊文章来看，其著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章，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代的印痕明显，如再坚持发展下去，有成为学者的趋向。尽管如此，还是呈现出一些特色，比如没有学院派表述的生硬，没有洋洋洒洒的术语轰炸，表述轻快，篇幅短小，且多以具体的批评对象的分析为主，在带有时代特色的同时，却没有那一时代批评文章的艰涩凝重，多了一些轻快之气。

其一些批评文章明显带有直击文坛的尖锐性和时效性。这样的文章如《如何看待新生代作家冲击长篇创作》（《文学报》，1998 年 6 月 11 日）、《新形势下文学批评及理论的建设》（《文论报》，1996 年 7 月 15 日）、《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新形势下，深入生活如何取得更好效果》（《文学报》，1996 年 5 月 2 日）、《漫谈近期长篇小说反讽、谐趣的叙述表情》（《南方文坛》，2009 年第 5 期）。这些文章针对性很强，“新形势下”以及“近期”等表述显示了文章的时效性，显现出“应运而生”的适时性。这是一个处身文学现场的批评者必备的素质，即对当下做出即时的回应。

其一些文章具有宏观性，角度新颖别致，富有启发性。王保生、沈斯亨在《1987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就指出，魏威、朱小如刊于《花城》1987 年第 4 期的文章《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比较论》把两个时期的文学视之为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在外力冲击下发生了某种饶有深意的锐变，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两个时期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表现的内质和指向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有助于理清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 年第 4 期）朱小如以关注当下文学现象见长。当然，关注当下并不能说明批评者的短视或者视野的狭窄，相反，朱小如先生的评论，不管是对于文学现象还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其批评都以纵深的文学史背景为参照，往往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为比照，以突破精神“窄门”见长，在具体对象的

批评中彰显宏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其批评文章大多针对具体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但往往能从具体延展到一般，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由具体的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出发对整个文学或者文坛发言。比如在《理论批评回到常识——由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谈起》一文中，在分析了同济学人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的现实针对性和目光的尖锐性之后，他说，“在我读郭春林《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后，思考最多的是当下文论、批评写作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就是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一定要做到论说的充分及物和保持当下时代语境的在场。而所谓的文学理论建构正是既要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又要能回到文学常识上来。”（《同济报》，2009年4月14日）由一部具体的批评著作的批评上升到理论批评应该坚守的原则——回到常识，这样，一篇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字就有了相应的普遍意义。又如刊发在《广西日报》的《走向经典性》（2002年9月13日）一文，主要针对的是历史小说，在例举了《李自成》等历史小说的成功之处和守成性之后，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二月河“帝王小说”、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因素，并认为这是历史小说“走向经典性”的重要动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摹写真人真事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特定的家庭族史来作为书写的对象，都拥有着一份沉甸甸的、深思熟虑的史识观照。”并特别强调，“了解历史的另一面，比只了解历史的片面，是一种成熟。”从具体的历史小说的论述引申到历史小说的观照，这里充分彰显的是批评由此及彼、由有限到无限的普适意义。

作为批评家，将眼光投向一个尚待崛起的群体，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情怀，而著文关注西部作家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朱小如对西部作家及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参加并见诸报道的研讨会有：龙仁青作品研讨会、冯玉雷作品研讨会、《白鹿原》研讨会、雪漠小说研讨会以及甘肃小说八骏作品研讨会等。出席研讨会发言关注西部作家、支持年轻作家，还发表精准似斩首行动的批评和判断，许多说法都具有定性的性质，得到普遍的认同。比如在青海作家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上，他说“龙仁青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天籁般的人性’。……这样一个主题的表达，它和我们以前认识的小说意义上的

推进、情节故事的发展是有很大差别的。”2008年《文学自由谈》第3期刊发的《天籁般的人性——龙仁青作品研讨会纪要》一文，就是以朱先生的判断为标题，反映了与会者对其精准判断的认同。此外，专门撰文推介西部作家也是朱小如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贴己的感受，坦荡的胸襟：简评史生荣的小说》（《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等，就是对西部作家关注的佐证。

著文关注未名作家。文学批评需要选择对象，将成熟作家或者文坛大家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可以携大家之气势而“居高声自远”，然而，一个批评家的责任并不在对文坛大家的锦上添花，而在于为未名作家雪中送炭，为其发展诊脉，为其发展张目，朱小如显然属于为未名作家诊脉并张目的批评家之一。他参加了许多未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是一种行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为一些不知名的作家撰写批评文章，为他们取得的些许成绩大唱赞歌。粗略统计，仅近年来经他关注并成为他的批评对象的作家作品有刘仁前的《浮城》（《为了扬“善”——刘仁前的长篇新作〈浮城〉读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月11日）、金宇澄的《繁花》（《为〈繁花〉鼓掌》，《新民晚报》，2013年1月27日）、龚桂华的《世情》《寒秋之洗手》和《苦窑》（《家族叙事与乡村政治》，《文艺报》，2010年4月9日）、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8日）、杨守松及其《小康之路》（《小康之路：经济加文化》，《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4日）等，可见，就文学批评而言，朱小如先生的着眼点似乎在于未来，对于成名作家艺术成就的总结也许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也许是与学院派批评的最大差异。当然他也有对像刘震云这样的大家、大作的批评，但都是在对话中发言，很少专文论及，这确实是比较独特的。由于阅读视野所限，我至今不知晓经朱小如先生评论的作家是否业已长成大作家，好在这些批评都是具体的作品批评，因此无需以此来考验先生的眼光，亦不能据此来证实他是否是“伯乐”。

当然，这些所谓“有声的批评”还应包括先生在对谈中的精彩发言。限于

篇幅，此处不赘。

编选、荐文、出席研讨会：无声的批评

作为一个文学报刊的编辑，对刊发文章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批评。经朱先生的手刊发的文学评论文章不计其数，反映了其对文学现象及文坛世相的判断，这些文章的观点虽是作者的，但经编辑的认可，也代表了编辑的意见或者默许的意见。所以刊发文稿的行为和刊发文稿的事实应该视作朱小如无声的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份报纸或者刊物会因为主持人而形成一定视角、一定立场甚至一定文风。比如《读书》杂志，主编的变易就带来关注点乃至文风的变易。朱小如作为理论部主任常年主持《文学报》的批评栏目，经常发现并刊发一些批评文章，其编选的文章除了代表作者的立场之外，也代表着《文学报》的立场，其中当然也隐含着主持人的立场，是一种隐身的在场。

作为一个阅读量很大的批评家，从众多的阅读对象中选择最为优秀的作品是一件艰难而有意义的事情。代表朱小如先生“选家眼光”的代表是《新世纪优秀中篇小说选 2001—2006》（上下卷）和《新世纪优秀短篇小说选 2001—2006》。

新世纪六年时间，中国众多的文学刊物发表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从中披沙拣金，选出优秀的作品不仅需要海量的阅读基础，更需要探幽烛微的特殊本领。翻检这两部选本，我们可以发现编选者对于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诸多基本命题的诠释。我十分期待编选文本中能有一个序言、编选说明或者后记之类的文字出现，来对以上命题进行必要的诠释，然而朱小如一字未提，三缄其口，以无言的编选解释了该解释的。除此之外，中国文学界还有一种与媒体合谋的批评方式，这就是年度小说排行榜，这种类乎商业行为的批评被冠以“推荐名家”的名义，朱小如在 2007 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 4 月排行榜的推荐评语中写道：“推荐名家这一词语明显有歧义，从动宾结构讲，其重心在名家及小说作品名家；从偏正结构讲，名家显然是指推荐者，他们是荐识作品的名家，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是慧眼识珠的行家。”

根据文本编排来看，显然是指后者，因此这一头衔获得要比批评家更有意义，这是学会对一个编辑家的最为重要的评价。”显然，他是认可这种批评方式的，带有“推荐名家”推荐意见的小说排行榜显然是在推荐行为之上加上了声音，是无声的行为批评和有声的批评合流。

推荐作品、评奖、制定小说排行榜、出席西部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出席一些尚未出道的小说家作品的研讨会，虽未发言或者未来得及发言，但其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这些都属于朱小如没有发声的文学批评，也许，此时的无声胜过有声。

发问：在职业的行为和批评者的睿智之间

6 在科学的研究中有一个说法，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出于职业的需要，朱小如经常变身记者，将自己从媒体后台的编辑转化为出入文学现场的记者，并以记者的身份现身文学现场、文坛旋涡，以记者眼光和视角对文学现象做出报道和判断，并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文字。如《文学批评如何重整雄风？》（《文学报》，2008年8月3日）、《世纪之交的文学现象》（《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等，虽然是报道，似乎很客观，但事实上在客观中隐藏着报道者的关注点、价值判断等主观立场和见解，因此也具有批评的价值。他的报道题目多为一些判断或者带有观念性的句子。比如在报道“上海市作协组织部分文学评论家就‘社会正义与文学批评’以及‘底层’写作等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时，他用了“审美与正义：‘底层写作’的困惑”这样一个题目，有力地总结了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并概括出一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形成启发人哲思的价值判断。又比如在报道杭州举行王手小说研讨会时，作者用了“来自生活和灵魂”（《文学报》，2007年6月14日）这样一个题目，从报道中的发言来看，似乎没有人提到这一说法，可见是报道者的概括，就该题目而言，它“质而径”地洞穿了文学书写的本质。还有人物访谈，他都用具有概括性的标题，很少用平淡的或者官样的标题。比如就是一篇与王手的访谈文章，他就用了“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标题，将采访对

象创作的精神实质概括在了这个题目里。识见不凡，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关于王手的这篇访谈录，明显地深化关于王手小说的研讨，其间的提问直逼作家的灵魂。还有关于江苏省作协主办的“苏童小说创作研讨会”的报道，作者用了“创作历程颇具代表性”这样一个题目，将整个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会议的重心上，突出了会议的主题。又如关于“苏州小说创作研讨会”的报道“保持特色寻求开拓”就很像一篇有价值的会议综述。按理说，新闻报道只呈现事实，由事实彰显价值，而朱小如的文学或文化报道，犹如文学批评文章，现象与本质共舞，事实与价值齐飞。在这些类似新闻性的报道和访谈文章中，有作者的问题意识，也带有作者的价值判断，似乎也带有作者的文学观念。笔者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批评，是一种无痕迹却有导向的文学批评。朱小如的文学报道和那些某某会议召开之类的报道简直是天壤之别，其间可见作者判断力，属于有深度的报道之列，属于职业行为中渗透了批评家睿智的篇章。这也许与批评家当记者有关。当然他关于文学活动的报道并不是每一篇都是这样，诸如《〈三农手记〉引起关注》《赵本夫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宁举行》等也不过是常规性质的报道罢了。

笔者以为，最能见出朱小如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批评意识的还是他对批评家或者作家的访谈，还有与批评家的对谈。

对谈是一种在场对话，对话者的思维可能在氛围、表情、问题的引导下出现飞跃，出现巧智，出现灵光。所以对谈这样一种方式曾经是上世纪 80、90 年代重要的一种批评方式，颇为时尚。而在朱小如参与的这种批评方式中，他尽显了批评家思维的敏捷和文学记者的敏锐，现举几例加以说明。在李敬泽、洪治纲、朱小如三人关于城市文学的对谈中（《艰难的城市表达》，《文汇报》，2005 年 1 月 2 日），朱小如率先发言，在简单陈述之后，朱小如急切地抛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作家们‘生活资源的缺失’，还是批评家们对城市叙事整个陷入‘审美’滞后？”“生活缺失”和“‘审美’滞后”，这一个问题关涉了作家和批评者两个文学活动的主体，问题尖锐而全面，概括准确而思想精到，对将讨论导入深层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对谈中，朱小如陆续有针对性地提出“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的评判系统有某种偏见？”“其实，物质的实

际享受，难道不也是文明的享受？或者换一个说法：城市文明如果不是体现在物质上，又体现在何处？”等问题，从对谈者的回应来看，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探讨问题具有引导或者转折的意义，不管是对谈者同意还是反对，从文脉上看，对谈者的回答或者反应却是受到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引导甚至牵引。比如关于后一个问题，李敬泽的回应是“我不同意把城市经验归结为‘物质’”，并由此展开自己的观点。在对于仁秋先生的访谈中，朱小如提出“你的这部长篇不仅仅是小说立意和艺术表达上和《围城》相像，更是艺术气息上的相像。不知是你有意为之还是受了《围城》无意识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想集中在《围城》那部老书上做文章，我感兴趣的是‘中西文化的强烈冲撞’和‘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以你在国外多年的生活经验，是‘冲撞’大于‘融合’吗？”（《〈请客〉：“冲撞”与“融合”》，《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23日）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一问题起点很高，既有与名著《围城》比照，又有上升到文化冲突的大视野的关照，既是一个文学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这一问题让于仁秋先生坦言：“你这个问题，不免使我有点紧张。”

访谈是一种互相启发的活动，问题的提出对于回答者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问题的高度决定着对谈、访谈的高度，朱小如的发问是有高度、深度和硬度的。因此这样的发问应该成为他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批评家是自己设问，是自我的对话，而访谈、对谈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能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与问题的高度、深度和硬度有关。

多声部合唱与侠士之风：批评的特色

总体而言，朱小如的批评可以视作声音、行为、发问的多声部合唱。其中他所著的正式批评文章，是其深思熟虑的郑重的发声，学理层面的东西比较多，类似大提琴，声音沉着而厚重，幽深而坚实；其行为批评包括编选、推荐、研讨会发言等如鼓，虽不时时发出声响，但适时发声，掌控着节奏，击中要害；其发问有着发问者的睿智，尖利而急促，往往能启发被问者的思绪，点中文学现象和文坛的要穴，虽是问题，也是观点，类似打击乐的金属乐器，轻轻一点，

却能发出悠长而尖锐的声音，引人深思，扭转讨论的进路。朱小如先生游走于这三者之间，娴熟地掌握各种乐器及其特性，在形成各自特色的同时演奏了多声部的交响。

朱小如上世纪 80 年代涉足文学批评，以类学院派批评起家，紧承当时社会风气，重视批评的方法论，语言平实中略带拘谨，三段论的痕迹比较明显。比如刊于 1985 年《电影新作》第 3 期的《声音——电影中的一个积极的剧作元素》就属于学术论文，明显带有这种痕迹，学院派的风格比较明显。“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时正好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年，且西化的文风、语气、术语盛行，身处上海这一文学批评的十里洋场，沾染上一点时代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然而在笔者看来，朱小如批评最值得重视的也许不是这些类学院派的批评文章，而是他作为媒体人的批评文字。从社会身份的角度讲，他本身不是学院派，并不处在学院严格的体制之下，他是一个文学编辑，站在自己的位置关注着文学场域的风起云涌，而作为文学记者，他可以通过对一些文学事件的报道和对一些当事人的访谈，通过自己的视角对文学现象做出相应的判断，产生应有导向作用。笔者把这种批评称之为媒体批评，朱小如的批评可以看做学院视野、专家立场和媒体文风的合奏。

值得注意的是，从类学院派的立场撤退之后，他的文章口语化倾向比较明显，犹如发言的记录（事实上一些文章就是发言的记录），文章也超脱了学院派判断的谨严、表述的严格，多了一些机警和时尚，比如他将阅读行为看做与小说家的“过招”，视作对广西三剑客的“挑战”，这无疑也将自己幻化成了一个剑客，将整个文学阅读比喻成为一场剑客之间的较量。他说“与鬼子这样的剑客初次过招，管保你累得手臂酸痛，内心惊恐，最后只剩下挨宰的份。”又比如说鬼子是鬼魅剑法的剑客，东西是个操持西洋剑法“颇具骑士风度”的“剑客”，而李冯又是一个长袖善舞、风流倜傥的剑客（《“挑战”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整个批评氛围和术语就是一套武侠小说的套路，大有描摹一场武林打斗场景的趋势，应该归为喻象式批评或者印象式的批评。这种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现代是很流行的批评方式，比如说司空图的批评和李健吾的批评就有这样的特点，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几近失传。不知朱小如是如

何得到这种秘籍并练就此等独门武功的。至于该文的语言，则尽展武侠腾闪挪移的妙处，灵活之至，与许多中规中矩的文学批评大异其趣，妙趣横生。同时，朱小如先生的文学批评，多追求在三千字内论述清楚、终结议论的快短精战法，有三招毙敌的侠士之风。媒体批评人的身份和职业习惯也许是成就这种文风和思想风格的重要因素。

从其从事文学批评的文脉历程来看，朱小如的批评思维和言语也许与职业有关，也许与个人的性情有关。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并且“生性不喜欢隐瞒自己的观点”（《对〈文学报·新批评〉的批评》，《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4期），其思致的性情因素成就了他的批评，不论是发言还是成文的批评，都以短小精悍见长，均以思致独特见长，扬弃了学院派批评的沉闷、学理之气，充斥着灵动之气，显现出散点透视的灵活。总体而言，他的批评前期比较知性，
10 后期比较诗性，往往在诗性的感知中渗透着知性的理智，在知性的沉着中闪烁着诗性的灵动。

2010年，在“第二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上，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在一片假话中出现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他的批评有时也不免带有“真实的偏见”的色彩，这也许是任何一个批评家所不可避免的，而这恰恰是文学批评最好、最真实的状态。

朱忠元

文学现象和思潮 / 001

01

何以“朦胧”，审美的退化——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一	003
寻根文学：走向悠久文化与亘古大地的文学——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二	011
知青文学：当代作家精神成长的投影——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三	021
女性还是女权？——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四	035
“先锋”：文学创作活力的崎岖路径——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五	047
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六	057
当前文学创作中艰难的城市表达——“城市叙事”三人谈	073
创作“瓶颈”与精神“窄门”——1960年代出生作家与长篇小说创作	079
由“创作局限论”引出的问题	093

文学作品 / 105

《废都》与《长恨歌》——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对话之一	107
《马桥词典》——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对话之二	121

02	《我的帝王生涯》与《许三观卖血记》——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对话之三	133
	《尘埃落定》《圣天门口》《白鹿原》《檀香刑》和《古船》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对话之四	143
	《圣天门口》三人谈	159
	去中心化写——龙仁青小说四人谈	165
	经验、历史与现实能力——与费振钟的对话	179
	对话程绍国：林斤澜与《林斤澜说》	187
	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与王手的对话	193
	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又都相距甚远	
	——关于何顿长篇新作《湖南骡子》的对话	203
	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与金宇澄对话	209

后记 / 219